

# 初探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 涂爾幹「社會事實」觀點之運用

李世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 摘 要

本研究以涂爾幹 (Durkheim) 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 為基礎，探討整體主義 (holism) 進行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本文認為，具有「強制力」的「社會事實」對於個人行為與態度深具影響力，並且在搜集相關文獻資料之後，嘗試整理成三項分析途徑。首先，可將「社會事實」視為單一變數，與其他因素一起列入分析模型，探討該項「社會事實」對於依變數的「淨影響力」。其次，可以「情境變數」來看待「社會事實」。將不同的「社會事實」分別設定分析模型，再進行不同「社會事實」情境之下的分析，比較不同模型依變數與自變數的關係，以瞭解不同「社會事實」情境之下，其構成成員行為影響因素之異同。再者，若是「社會事實」對於某項自變數具有特殊意義，則可將兩者予結合，以「交互影響變數」方式列入分析模型，以檢證其結合效應。在結論中，本文摘述研究要點，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關鍵詞：**涂爾幹、社會事實、量化分析、控制變數。



## 壹、前言

社會科學是運用方法研究人類社會，以期達到對人類群體生活有客觀與系統的認識。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是瞭解人類的社會行為，探索人類社會行動所具有的「意義」(meaning)。

至於探求「社會行動意義」的方法，涂爾幹主張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其認為，最重要的社會意義是存在於超越個體之外的「社會事實」，在這些「事實」包含了個體必須經由社會化而整合到其中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涂爾幹進一步表示，社會對於個人來說，是一個外在的客觀體，規範著人類的行為。而研究社會的基本邏輯及法則就是將「社會事實」作為一種物件般看待，並進行研究。而謂「社會事實」則是由集體性的信仰、傾向與守則所構成，也由於其「集體性」，因此，或多或少帶有強制性的特徵，使成員採取相同的行動。<sup>1</sup>由此觀點出發，一切在社會裡的信念、民風、習俗、社會制度及「社會世界」(social world)都如外在物件一般，在人類生活之外，控制與影響人類生活。<sup>2</sup>

至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涂爾幹認為，「社會事實」與一切社會裡所發生的事情與行動，都可以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用客觀、系統方法加以研究，從中找出人類生活的「定理」(regularity)，和人與社會相互的關係。因為他相信人類活動與社會行為的本身，是受制於外在於人的「社會力量」(social force)。而這股外在於人的力量，成為了人類生活現實外存在的社會現實，控制與規範人類行為。<sup>3</sup>因此，涂爾幹在方法論上主張「全體不等於部分之總和」，反對個體心理的化約論，堅持屬於社會全體的事物「自成一類」，只能依「社會事

實」自己的特性來說明。<sup>4</sup>

詳言之，根據涂爾幹的學理，社會科學研究是走向「實證主義」(positivism)。這學術典範所著重的研究方向，就是借用「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的方法來驗證社會行動及現象，試圖找社會出行為背後的深層結構。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一般而言，實證科學的倡導者，較常主張「個體主義者」(individualists)，而非「整體主義者」(holists)。<sup>5</sup>因此，亦有若干學者認為，涂爾幹的途徑為「反自然科學」的實在論，因為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不同，其差異在於社會的表述。<sup>6</sup>進一步來說，涂爾幹的研究集中點在於社會外在制度、大型的社會結構，從宏觀制度的角度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制於「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被社會規章、規範所約束。他更指出社會發展有其進化途徑，人類社會行為是受制於社會法則；但是在分析方法方面，則要依循自然科學之方法來分析社會，以使我們可以加強「理解、預測及控制」社會之能力。<sup>7</sup>

基於前述涂爾幹的學說，本文認為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為探求社會科學與社會行為義意有效途徑之一。而且，本文更關心如何落實此方法，特別是在量化研究中，如何運用「社會事實」進行分析。因此，本文首先簡述涂爾幹學說與研究意旨。其次，探討「社會事實」與個人關係。再者，回顧涂爾幹的研究實例並探索其他研究方式。最後，嘗試提出結論與建議。

## 貳、「社會事實」與個人關係

涂爾幹為社會學之創立者，認為社會會影響人的「思想」(idea)。他提出以實證方法去研究社會，為事物尋找因果關係，確立了實證主義的社會學，

<sup>1</sup> Emile Durkheim, 1946.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sup>2</sup> 莫家豪，1997，《社會學與社會分析》。香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

<sup>3</sup> 江行良，2000，〈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論〉，《元培學報》，第7期，頁109-122。

<sup>4</sup> 蔡錦昌，2001，〈涂爾幹所謂「實證科學」〉，《東吳社會學報》，第10期，頁289-295。

<sup>5</sup> Martin Hollis, 2000.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6</sup> Gerald Delanty, 1997. *Social Science 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up>7</sup> 莫家豪，同前揭書。



並認為社會學能回答到一些其他學科所不能回應的問題。在涂爾幹的眼中，社會就好像一個大自然一樣 (society as nature)，因此，研究自然的方法可以應用於研究社會上，他的社會學亦因此而帶有實證主義。<sup>8</sup>

至於涂爾幹提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社會事實」是具有「真實性」(fact)、「外在的」(external) 特性，不是由人的想法可以改變或影響，而且事實可以被他人觀察得到，並且可以感受到和測量到，最重要的是它對人有影響力，會將壓迫人們到一個方向。綜言之，社會是凌駕於個人特性的，若不照著做的話就會受到「懲罰」(penalty) 或者「孤立」(isolation) 的後果。而將各種「社會事實」組合起來，就是社會的面貌了。<sup>9</sup>

對於「社會事實」因素如何對於個人產生影響，除了涂爾幹之外，若干學者以社會學研究途徑的「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ism) 來解釋外在社會的影響力。其立論主張，個人社會特徵決定個人取向，這些社會特徵提供民眾基本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資訊脈絡」(informational context)，以及「個人網絡」(personal network)，藉由團體建構人際互動關係，進而影響個人意見與行為。相對而言，屬於某種性質的團體成員擁有高度「政治同質性」(political homogeneity)，相較於其他團體，成員彼此政治態度頗為相似。<sup>10</sup>在研究

<sup>8</sup> 顧忠華，1997，《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台北：台灣書店。

<sup>9</sup> Emile Durkheim, Ibid. Pp1-2.

<sup>10</sup> 相關研究論點可參閱：傅恆德，1996，〈決定投票選擇的結構、心理和理性因素：民國八十五年總統選舉研究〉，《選舉研究》，第3卷，第2期，頁157-185；Bernard R. Berelso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bert Huckfeldt, John Sprague, and Jeffrey Levin. 2000.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Deliberation in the 1996 Election: Campaign Effects on Accessibility, Certainty, and Accu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3): 641-651. Robert Huckfeldt, Ken'ichi Ikeda, and Franz Urban Pappi. 2000. "Political Expertise, Interdependent Citizens, and the Value Added Problem in Democratic Politics." *Japanese Journal*

方法上，社會學研究途徑強調生態環境因素，以居住地區、宗教、種族（或族群），以及職業等結構與團體特徵的總體資料進行研究。

另外，相對於社會學研究途徑，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強調個人對於特定社會團體的心理歸屬感，從而產生「群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 與「群體認同」(group identity)，形成固定的價值體系及其思想信念。<sup>11</sup>詳言之，社會心理學者主張，個人置身於特定團體之中，會與其他成員發生互動關係，經過相互影響後，個人思維與團體文化產生整合作用，形成自我思想、態度，以及行為。因此，該學派認為，研究個人態度必須著重於個體與群體的互動結果。

由前述學者的主張得知，「社會事實」對於個人具有重大的影響。然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是人的群體行為，人的價值觀、思想、感情均會隨社會價值觀以及時間而變化，進而影響行為。因此，社會科學的環境中，因素的作用很複雜，很難肯定「已知個案」與「未知個案」之間的關係。因此，以下本文將藉由量化分析的相關文獻，探討「社會事實」對於行為影響的分析方式。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2): 171-195. Alan D Monroe, 1975.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sup>11</sup> 例如 Paul R. Abramson, 1979. "Develop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Life-Cycle, Generational, and Perio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1): 78-96.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Philip E Convers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 David E. Apter. New York: Free. Pp. 206-261. Philip E. Converse, and Roy Pierce. 1985. "Measuring Partisanship."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 143-166. Alan Gerber and Donald Philip Green. 1998. "Rational Learning and Partisan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2): 794-818. Warren E. Miller, 1976. "The Cross-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ed. by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annis Farli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Pp. 21-32. David O. Sears and Nicholas A. Valentino. 1997. "Politics M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1): 45-65. 皆有相同觀點主張。



## 參、「社會事實」對於個人影響的分析方式

涂爾幹曾對自殺行為做了有系統的學術性論述。其認為，在一個群體當中自殺率是相當穩定的，不會任意變動，即使產生了變動，也是由於環境所造成的結果。而社會學家便是要找出這些環境

與自殺率變動之間的關聯性，亦即應將重點置於分析自殺率與社會現象間的關係。以宗教為例，如表一所示，涂爾幹調查不同國家後發現，信仰新教信徒自殺率遠高於天主教徒與猶太教徒。其差異最少在 20% 至 30% 之間，最大者在 300% 左右。涂爾幹強調，此結果並無法解釋不同宗教教義的差異，但是，表示不同教會與信徒的關聯。

表一：各國各類教徒的自殺率（每百萬人）

|                  | 新教    | 天主教   | 猶太教   | 統計者姓名 |
|------------------|-------|-------|-------|-------|
| 奧地利 (1852-1859)  | 79.5  | 51.3  | 20.7  | 瓦格納   |
| 普魯士 (1849-1855)  | 159.9 | 49.6  | 46.4  | 瓦格納   |
| 普魯士 (1869-1872)  | 187   | 69    | 96    | 莫爾賽里  |
| 普魯士 (1890)       | 240   | 100   | 180   | 普林金   |
| 巴登 (1852-1862)   | 139   | 117   | 87    | 勒古阿   |
| 巴登 (1870-1874)   | 171   | 136.7 | 124   | 莫爾賽里  |
| 巴登 (1878-1888)   | 242   | 170   | 210   | 普林金   |
| 巴伐利亞 (1844-1856) | 135.4 | 49.1  | 105.9 | 莫爾賽里  |
| 巴伐利亞 (1884-1891) | 224   | 94    | 193   | 普林金   |
| 沃爾登堡 (1846-1860) | 113.5 | 77.9  | 65.6  | 瓦格納   |
| 沃爾登堡 (1873-1876) | 190   | 120   | 60    | 涂爾幹   |
| 沃爾登堡 (1881-1890) | 170   | 119   | 142   | 涂爾幹   |

資料來源：黃丘隆（譯），1989，《自殺論》。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127。

雖然，涂爾幹是最早在社會調查中嚴格地使用統計方法的重要學者，並且在其運用數據與統計方法進行推理之下，獲致相當成果。<sup>12</sup>

<sup>13</sup>但是，不可諱言地，在數據與統計方法之中，兩個變數之間顯示具有關聯或有關係，並不足以構成自變數影響依變數的原因。因此，研究者必須透過進一步的統計方法，對於其他替代的解釋變數進行

控。直言之，利用「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s) 來測量可能的替代解釋，以決定變數之間的關係。

<sup>14</sup>

至於控制第三變數的方法，一般而言約略有三種情況。首先，若是第三變數對於依變數具有影響作用，則針對第三變數的作用，運用數學方式加以調整，計算「淨相關係數」(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亦即計算已扣除第三變數之作用後，所得到的相關。其次，在物理上改變第三變數，使

<sup>12</sup> 黃丘隆(譯), 1989,《自殺論》(Suicide. Durkheim 原著)。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Ted Benton and Ian Craib. 2001.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sup>13</sup> 黃丘隆，同前揭書，頁 127。

<sup>14</sup> 朱柔若(譯)，2002，《社會研究方法》(Social Research Methods. Neuman 原著)。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頁 578。



得它在將要檢驗的所有事例中均屬相同。再者，選擇第三變數均相同的事例，進行分析。<sup>15</sup>但是，由於社會科學並不容易有「物理上改變」的操作，故在本文之中，將第二種與第三種控制變數方式視為同一方式。換言之，即將第三變數「控制」為相同，進行分析。

在前述方法中，研究者採行的「控制」方式，大多屬於第一項的數學計算方式調整。亦即，根據理論模型，設定若干相關變數，以觀察吾人關心變數的作用。在此分析模型中，除了將「社會事實」列為自變數之外，尚須將其他若干可能的影響因素列為控制變數，一同進行分析，以確定變數之間的關係。

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與「和平公投」同時舉行時，兩組總統候選人對於「和平公投」的辦理，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者，在野陣營極力杯葛公投，鼓吹其支持者拒領公投票，一般認為政黨分歧足以解釋和平公投票意願與取向。為探求影響「和平公投」的因素，黃偉峰以地區的省籍人口比例，區分為「閩南人集中地區」、「客家人集中地區」、「外省人集中地區」以及「省籍混合區」，再加入「陳水扁的得票率」、人文區位資料（如，人口密度、年齡比例、識字率等），以及政府收入支出的總體資料等，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明顯地「陳水扁的得票率」較高的地區，「和平公投」之投票率亦較高。<sup>16</sup>同時，在「閩南人集中地區」「和平公投」的投票率也較高。反觀，若干政府收入與支出的項目，則較不具影響。此外，在投票贊成公投方面，其影響因素也大致與「和平公投」投票率的原因相同。

此結果反映著，選前選舉陣營的動員，以及族群間的動員，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的影響作用。反觀，較不具「強制力」的地區政府之收支情形等因素，則未顯示出影響力。換言之，相當程度地反映，

具有「強制力」的「社會事實」較能趨使個人產生行為。進一步來說，雖然個人行為的影響因素眾多。但是，如誠涂爾幹的主張，由集體性的信仰、傾向與守則所構成且或多或少帶有強制性的「社會事實」，將使其成員採取相同的行動。

除了將「社會事實」視為單一變數，並加入若干控制變數進行分析外，如欲探究不同「社會事實」之下，行為人行為之差異，則可採第二種與第三種控制變數方式。即先將「社會事實」視為控制變數，在相同「社會事實」的情境之下進行分析，再比較不同「社會事實」之下，各項變數影響作用有何不同。亦即，比照「情境變數」(moderating variable)的方式，判斷在不同「社會事實」之下，個人行為影響因素的異同。

例如，陳陸輝以不同世代區隔選民，分別設定模型，研究其政黨認同的差異後發現，隨著世代的不同，影響政黨認同的因素會有所改變。其文中提到：

第一代選民(1942年以前出生者)由於長期的「大中國」教育，因此，影響他們對國民黨認同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人」的自我認定。而偏向獨立的統獨立場，影響第一代選民對民進黨認同的傾向較顯著。就第二代選民(1943年至1960年出生者)而言，他們傾向利用統獨立場來決定他們對國、民兩黨的認同。至於面對政治開放的第三代選民(1961年以後出生者)，面對主張獨立的言論禁忌解除以及台灣人意識抬頭，傾向獨立立場及「台灣人」自我認同，是影響他們對民進黨認同的重要因素。<sup>17</sup>

從該文中可瞭解，隨著時代變遷與政治改革，民眾的教育與約束會有所不同，因而產生了不同的行為影響因素。例如，第一代選民在「大中國」的教育之下，其認同國民黨係基於「中國人」的自我認定。而認同民進黨者，則是基於「獨立立場」。到了第三代選民，於面對政治的開放、主張獨立的言論禁忌解除，以及台灣人意識抬頭，認同民進黨

<sup>15</sup> 郭秋永，2001，〈權力與因果：方法論上的解析〉，《臺灣政治學刊》，第5期，頁64-131。

<sup>16</sup> 黃偉峰，2004，〈從選票區位結構試探影響2004年「和平公投」之相關因素〉，《臺灣民主季刊》，第1卷，第3期，頁73-98。

<sup>17</sup>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7卷，第2期，頁128。



的重要因素並不僅是「獨立立場」,「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也促使民眾對於民進黨的認同。

詳言之,在不同「社會事實」構成環境之下,產生了不同面向的「強制力」,並影響個人行為與態度。因此,若將不同「社會事實」區分為不同分析模型,再分別進行分析與比較。其結果可呈現不同「社會事實」的「強制力」,並可比較出影響個人態度與行為的因素。

除了前述兩項途徑之外,本文以為如果吾人所關心的「社會事實」對於某項自變數特別具有意義,則可以「交互影響變數」(interactive variable 或稱為 multiplicative term) 分式分析。換言之,以「社會事實」為基礎,區分重要自變數進行分析。其操作方式係先將兩項變數予以結合(例如「社會事實」與個人身分背景),成為「交互影響變數」之後列入分析模型,再加入若干控制變數後,檢證其結合效應。

例如,吳重禮與李世宏認為,當某些弱勢團體菁英取得若干政治公職(例如地方行政首長)之後,且掌握政治權力的時間愈久,其對於政治決策過程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進而激發所屬團體成員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促成政治利益及其相關目標。之所以如此,其理由有二。其一,在權力效應愈高的地區,選民預期政治參與的利益獲得高過於成本支出,因此傾向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其二,在權力效應愈高的地區,弱勢團體菁英取得更多的政府職位,而且掌握權力的時間愈久,將鼓勵弱勢團體改變政治態度,提升政治參與意願。<sup>18</sup>

此觀點一般稱為「賦權理論」(empowerment theory)。<sup>19</sup>簡言之,該立論主張,弱勢團體菁英「當家作主」擔任地方行政首長,會促使該團體成員傾

向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提升政治參與意願。如是以觀,相對地,在弱勢團體菁英「當家作主」擔任地方行政首長的地區,或多或少形成於其他不同團體涉入政治事務的圍籬。易言之,在「賦權理論」作用的地區,具有若干「正面」與「負面」的「強制力」,將導致不同團體,產生不同的態度與行為。

吳重禮與李世宏利用「賦權理論」,對於客籍縣市長執政地區的客籍選民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之研究發現,當客籍縣市長執政地區與「省籍」分別以兩項變數列入分析模型時,該兩項變數對選民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皆不具影響力。然而,將此兩項結合之後列入模型分析,其結果呈現,非客籍縣市長執政地區的客籍選民政治信任感較低。另一方面,在投票參與的部分,客籍縣市長執政地區,客籍選民的投票參與最高。換言之,在職縣市首長的省籍背景,影響著不同省籍背景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直言之,客籍縣市長的執政可能會帶動客籍選民的投票參與,相對地,也可能降低了其他族群的投票參與。反觀,在非客籍縣市長執政的地區,客籍選民則產生了偏低的政治信任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若是未利用不同的「社會事實」將個人特徵予以細分,則並不能分析出「社會事實」的效應,此結果饒富思考意義。<sup>20</sup>

對於「交互影響變數」分析方式的發現,尚有其他不同例證。例如許勝懋針對 1998 年與 2002 年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探究影響選民分裂投票的因素。其研究結果指出,選民對於府會分屬不同政黨的「制衡觀」,並未影響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甚者,相較於 1998 年的情形,2002 年台北市選民的制衡觀念呈現下降的趨勢。<sup>21</sup>

但是,吳重禮、徐英豪、李世宏以「交互影響變數」方式,將選民對政黨的認同情形與「制衡觀」結合成「交互影響變數」後,分析 2002 年台北市

<sup>18</sup> 吳重禮、李世宏, 2005,〈政治賦權、族群政治與政治參與: 2001 年縣市長選舉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頁 69-115。

<sup>19</sup> 詳細「賦權理論」之觀點請參閱 Lawrence Bobo and Franklin D. Gilliam, Jr. 1990. "Rac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Black Empower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2): 376-393.

<sup>20</sup> 吳重禮、李世宏, 同前揭文。

<sup>21</sup> 許勝懋, 2003,〈台北市民具有制衡觀嗎? 1998 與 2002 年市長選舉之比較研究〉,「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與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02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選民分權制衡心理認知與分裂投票行為的關係。在考量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政黨認同的交互影響之下，在同一政黨認同選民之中，抱持「制衡觀」立場的選民傾向於分裂投票，而排斥「制衡觀」的民眾則較易採取一致投票的行為；其中，以泛綠陣營認同者的差異最為顯著。<sup>22</sup>

該文作者認為，此結果的意義顯示，在分析國內投票行為時，必須注意政黨之間意識形態壁壘分明、政策立場差異明確的政治生態，特別是以觀察個案來說，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是屬於藍綠兩大陣營對峙的情形，獨立候選人絕少有競選的空間，政黨意識更加明顯。因此，選民「制衡觀」的效應可能為政黨認同因素所影響。

進一步來說，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施政績效普遍獲得民眾肯定，施政滿意度大約在六成至七成之間，而民進黨候選人李應元則相對處於劣勢。對於泛綠認同的選民來說，其支持對象當選行政首長的可能性較低，故在選擇市議員投票對象時，政黨認同與「制衡觀」都會促使其支持泛綠候選人。反觀，對於泛藍認同的選民而言，其支持對象當選行政首長的可能性較高，在選擇市議員投票對象時，政黨認同與「制衡觀」的作用會產生不同結果，因此，減弱了「制衡觀」的影響力。如此一來，形成「泛綠陣營認同者的差異最為顯著」的現象。

另一方面，如果在研究中，將政黨認同與「制衡觀」視為兩項變數，分別列入分析模型，則對於相同政黨認同類型的選民，其制衡觀點是否會左右投票行為，並無法從中得知。在國內藍綠政黨結盟的態勢之下，選民投票行為深受若干重要變數（尤其是政黨認同）的影響，因此，可能減弱分權制衡心理認知的解釋力。但是，這似乎並不意味著分權制衡的心理認知無法反映在投票行為層面。相反地，在控制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素之下，「制衡觀」對於民眾是否採取分裂投票，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預

測能力。

由此例證可得知，「社會事實」除了可以當成一項變數進行分析外，更需要瞭解「社會事實」其他變數之關係，甚至與相關變數結合成「交互影響變數」進行分析，始能發覺更多行為與態度。

綜觀前述各項途徑，對於「社會事實」之分析方式約略有下列三項。首先，如果「社會事實」對於依變數具有相當影響力，而與其他自變數（控制變數）關聯甚少，則採第一項途徑將「社會事實」與其他控制變數同列為自變數，計算對於依變數的「淨相關係數」。其次，如果「社會事實」可能造成其他自變數對依變數的作用，可將「社會事實」視為「情境變數」，以不同分別「社會事實」區別分析模型，再比較不同情境之下，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關係。再者，若是「社會事實」對於某項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特別具有影響力，則可將此「社會事實」與自變數結合成「交互影響變數」，分析其共同作用。換言之，研究者必須考量現實情況，才能對於「社會事實」做有效的分析。

## 肆、結論

無庸置疑地，具有「強制力」的「社會事實」對於個人行為與態度深具影響力，研究時不容小覷。但是，《自殺論》的「編著」（editor）辛普森（Simpson）曾表示，「涂爾幹揭示了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原理在於實踐中的具體運用。他將社會看作一個由部分組成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又大於部分之和，這樣一種社會現實主義理論與其相關的群體性表現和群體心理概念運用於這個特殊的領域，並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涂爾幹不僅提出了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富有啟發性的指導原則，而且在相當廣泛的研究領域中進行了實際驗證。假如我們對他的著作進行補充和修訂，並在此過程中提高了我們的認識，那他會是第一個接受我們的做法」。<sup>23</sup>基於此，本文以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觀點為基礎，探討「社會事實」對於個人行為影響的分析途徑，並嘗試探求整體因素在社會行為中的意義。

<sup>22</sup> 吳重禮、徐英豪、李世宏，2004，〈選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以2002年北高市長暨市議員選舉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21期，頁75-116。

<sup>23</sup> 黃丘隆，前揭書，頁2-4。



如前所述,涂爾幹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相當重要性,並且在研究問題時,採用社會學整體主義角度也具有深遠意義。但是,當涂爾幹在 19 世紀最後 10 年進行調查時,統計方法尚待發展。因此,其變數間的相關分析大多採用「簡單關聯」(simple correlation)。然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是人的群體行為,作用因素相當複雜,在分析時有必要採用「多項關聯」(multiple correlation),並且考慮「控制變數」的問題。

本研究以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與量化統計分析的「控制變數」為出發點,搜集相關文獻資料、討論問題。本文依據一般研究方法,約略整理出下列三項分析途徑。首先,將「社會事實」視為單一變數,與其他因素一起列入分析模型,探討該項「社會事實」對於依變數的「淨影響力」。其次,可以「情境變數」來看待「社會事實」。亦即將不同的「社會事實」分別設定分析模型,再進行不同「社會事實」之下,依變數與自變數之間關係的比較。如此一來,可探知不同「社會事實」構成之下,其成員行為之異同。再者,若是「社會事實」對於某項自變數具有特殊意義,則可將兩者予結合,以「交互影響變數」分式列入分析模型,以檢證其結合效應。所得結果可顯示,在不同「社會事實」因素下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

儘管本文針對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觀點,對於整體主義的量化研究方式提出若干淺見。但是,仍有許多未盡之處。首先,所謂「社會事實」包羅萬象,本文僅略為舉例說明,研究時乃須針對社會特性,深入發覺「事實」,始能對於人類行為做出更有意義的解釋。其次,本文主要針對量化分析方式加以說明,然而統計數字之間更須具有理論基礎或意義層次的解釋,才能正確瞭解行為意義,此為實際研究時必須注意的部分。再者,本文為呈現多項分析模式,故所採的例證皆為已發表過的「二手資料」,日後如果針對主題,搜集原始資料進行分析,或輔以訪談等質化分析方式,相信可使內容更為完整。基本上,本文認為整體主義對探求社會行為與意義具有相當重要性,期盼藉由本研究引發研

究者的共鳴,相互切磋,以增進社會科學的研究。

## 參考文獻

1. 江衍良,2000,〈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論〉,《元培學報》,第 7 期,頁 109-122。
2. 朱柔若(譯),2002,《社會研究方法》(Social Research Methods. Neuman 原著)。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
3. 吳重禮、李世宏,2004,〈政府施政表現與選民投票行為:以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第 17 卷,第 4 期,頁 1-24。
4. 吳重禮、李世宏,2005,〈政治賦權、族群政治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選舉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頁 69-115。
5. 吳重禮、徐英豪、李世宏,2004,〈選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以 2002 年北高市長暨市議員選舉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 21 期,頁 75-116。
6. 莫家豪,1997,《社會學與社會分析》。香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
7. 郭秋永,2001,〈權力與因果:方法論上的解析〉,《臺灣政治學刊》,第 5 期,頁 64-131。
8. 許勝懋,2003,〈台北市民具有制衡觀嗎? 1998 與 2002 市長選舉之比較研究〉,「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與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02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9. 傅恆德,1996,〈決定投票選擇的結構、心理和理性因素:民國八十五年總統選舉研究〉,《選舉研究》,第 3 卷,第 2 期,頁 157-185。
10.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 7 卷,第 2 期,頁 109-139。
11. 黃丘隆(譯),1989,《自殺論》(Suicide. Durkheim 原著)。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 黃偉峰, 2004, 〈從選票區位結構試探影響 2004 年「和平公投」之相關因素〉,《臺灣民主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73-98。
13. 蔡錦昌, 2001,〈涂爾幹所謂「實證科學」〉,《東吳社會學報》,第 10 期,頁 289-295。
14. 顧忠華, 1997,《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台北:台灣書店。
15. Abramson, Paul R. 1979. "Develop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Life-Cycle, Generational, and Perio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1): 78-96.
16. Benton, Ted, and Ian Craib. 2001.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17. Berelson, Bernard R.,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 Bobo, Lawrence, and Franklin D. Gilliam, Jr. 1990. "Rac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Black Empower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2): 376-393.
19.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20. Converse, Phili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 David E. Apter. New York: Free. Pp. 206-261.
21. Converse, Philip E., and Roy Pierce. 1985. "Measuring Partisanship."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 143-166.
22. Delanty, Gerald. 1997. *Social Science 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3. Durkheim, Emile. 1946.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24. Gerber, Alan, and Donald Philip Green. 1998. "Rational Learning and Partisan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2): 794-818.
25. Hollis, Martin. 2000.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Huckfeldt, Robert, John Sprague, and Jeffrey Levin. 2000.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Deliberation in the 1996 Election: Campaign Effects on Accessibility, Certainty, and Accu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3): 641-651.
27. Huckfeldt, Robert, Ken'ichi Ikeda, and Franz Urban Pappi. 2000. "Political Expertise, Interdependent Citizens, and the Value Added Problem in Democratic Politic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2): 171-195.
28. Miller, Warren E. 1976. "The Cross-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ed. by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annis Farli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Pp. 21-32.
29. Monroe, Alan D. 1975.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30. Sears, David O., and Nicholas A. Valentino. 1997. "Politics M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1): 45-65.



# A Probe on Methodological Holism: The practice from Durkheim's viewpoint on "social fact"

**Shih-hung Lee**

Adjunct Instruct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probing holism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is view,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fact" of Durkheim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attitudes. This paper advocates that "social fact" compels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attitudes influential, and try to compile three of way. First, "social fact" as a single variabl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ogether with other factors measure the net-impact in model. Second, take "social fact" as "moderating variable", will be different "social fact" was set on model, and then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 under analysis,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mbers of its composition facto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fact". Furthermore, if the "social fact" with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variables, can be combined they to "interaction variable" included in analysis to examine how their effect. In conclusion, summarize the major findings and propos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Durkheim, social fa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

---

Corresponding auth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64, Wen-Hua Road, Hu Wei, Yun Lin, 63208, Taiwan.

Tel : 05-6315186

E-mail : cobb@nfu.edu.tw

